

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议程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中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思路。在诸多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中,创造性介入理念提出了完整的知识框架,包括概念界定、案例支持和理论根源以及未来场景设想等。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可以深入和深化创造性介入的实证研究,诸如介入的类型学、介入的标准和成效评估、中国外交对外介入问题中的利益、伦理以及政治等问题的平衡,同时也包括时间节点问题的研究。基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实践归纳,可以提炼和总结中国外交行为模式及其规律,有利于创造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关键词】 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知识谱系;研究议程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5-0065-06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外交步入新的时代,关于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讨论日益成为热点。冷战结束前后,为应对中国面对的不利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适时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总方针,在此指引下,中国外交克服了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开展了多层次的双边、周边、多边外交,建立了各种面向 21 世纪的伙伴关系。进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及美欧自身问题的出现,诸如九一一事件乃至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国内学界对于要不要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赞成,有反对,更多的是折中。^{[1](P.4-9)[2](P.62-66)[3](P.24-27)[4](P.35-40)[5](P.13-19)} 上述争辩有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自身的国际定位及国际环境,但是,它们仍没有指出中国外交转型的现实和走向(亦即到底中国外交转型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进一步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

近期,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中的“创造性介入

理念”直面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提供了完整的转型经验归纳和理论论证。^[6]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国外交新理念,“创造性介入”既有成功案例的支持,也有基于全面的理论思考。创造性介入理念的提出,使得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从停留于“应然”层面(即要不要的问题)转向了“实然”层面(即如何转型?转型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是什么?)。总之,在既有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中,创造性介入理念独树一帜,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亦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和深化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实证研究。

一、创造性介入的思想谱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位,^[7]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国家利益也逐步全球化,在此背

景下,中国外交也掀起了多个高潮,诸如奥运外交、世博外交等层出不穷,中国外交的议题也逐渐多元化,外交与国内政治的紧密联系日益突出,关于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讨论已是学界的常态话题。创造性介入理念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 创造性介入的概念

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不同的是,创造性介入理念“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6](P.4)} 笔者的解读是,创造性介入理念兼具作为知识导向的理论和作为行动导向的论的双重身份。就作为行动导向的理论而言,创造性介入理念是紧密联系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特别是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这表明,创造性介入理念是基于扎实的中国对外关系案例分析归纳总结出来的一套外交行为准则和规范。很明显,一方面,它已脱离了早先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主义之争”,即关于转型本体可能性及世界观的争辩,而是从中国既有的实践出发,总结出转型的行为特性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创造性介入理念又具有规范理论或知识导向理论的特性,亦即在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它又系统地整理了创造性介入的理论根源或支持,而且还从未来场景假设的角度出发,依据创造性介入的逻辑,分析了中国与国际和地区互动时的创造性介质及其场景情况。因此,创造性介入理念是介于知识理论和行动理论之间的一种问题解决型政策思想或理论准则。

创造性介入理念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它更多的是从实际出发,详细剖析有所作为的条件性。它既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也具有理论建构上的逻辑演绎过程。从概念辨析来看,创造性,“是指应用新颖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6](P.9)} 因此,创造性最根本的

特性在于创新。中国外交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是指以新颖的方式,参与、加入、切入、卷入到相关国际事务当中,最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谓事半功倍。^{[6](P.9-10)} 基于上述分析,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或特性主要有三点:^{[6](P.5)} 第一,对国际环境的态度依然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更为紧密。第二,强调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即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在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范和话语观念方面要更加“有所作为”。第三,充分接受挑战,而避免思维惰性,激发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总而言之,创造性介入,就是一种“聪明的有所作为”。

(二) 创造性介入的经验

如果没有成功或翔实的中国外交实践支持,那么创造性介入理念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要提炼、归纳中国外交转型的理念变化,首要的就是一切从实践出发,寻找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实践。根据笔者的归纳,中国的创造性介入实践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周边责任。^①中国周边不仅与中国安全息息相关,而且与整个亚洲的国际地位相关。由于历史进程中现代化过程的特性,中国周边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外交均出现一些问题,而且中国与相关周边国家还存在一些领土争端以及权力竞争问题。中国如何发挥在周边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大国的周边责任感,这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美国等霸权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中国在相关热点问题以及重要大国关系发展中,也突出了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创新。中国在缅甸问题上发挥积极的调停作用,帮助联合国发挥影响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不能不说明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也是创设了六

^① 这些案例包括朝核问题、缅甸和东盟等周边地区问题,中国发挥一些居间调停等介入性的作用。

方会谈机制，发挥了主要的斡旋和调停作用。

第二，国家责任。^①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中国对外关系实践也必须承担着相应的国家责任。国家责任说起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则不然，它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当中。比如，中国外交如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统一，这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中国如何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基本利益，包括生存、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体现的是中国外交以人为本的原则问题。因此，在实现国家责任方面，同样需要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台海局势的缓和为两岸和解争取了时间和经验，同时也为促进两岸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近些年，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举措也体现了聪明性的介入，比如经济合作的起步、民间互动的开创以及关于“台独”分子和台湾地区人民的区分等。2011年2-3月，针对利比亚战火纷飞的乱局，中国外交以大手笔撤侨，让西方普通人士也为之惊羨。

第三，国际交往。^②由于长期与国际社会的隔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方面确实存在经验不足之处。但随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增多，比如中国早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越来越扮演着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在国际交往方面，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创造性介入实践。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建立了系列的战略对话机制，比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形成了定期举行的固定化机制；在地区争端解决上，中国以平等、合作以及互利的态度，帮助苏丹等国家重返国际社会；在公共外交实践方面，傅莹等中国外交官

创造性地以人性化的书信方式，在英国主流媒体中解释中国的政策，促进了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认知。

创造性介入也是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持的，这种理论支持同时也表明了创造性介入的动力来源。依笔者看来，这种动力支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国际和国内动力来源。

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一则，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外交的责任和角色产生了更多的要求。^③全球公共问题的凸显，进一步要求主要大国都不能置身事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问题。国际社会早已步入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诸如“世界是平的”等学说的盛行，皆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日益紧密。二则，中国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是具备一些客观的国际条件的。^④从国际压力方面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积极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政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开展周边外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比如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开创性创设了数个国际组织和周边协调机制，包括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创设六方会谈机制；中国与东盟也开展了全方位的交往，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推向了高度信任的伙伴关系阶段。

其次，从国内层面来看。一则，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的，尽管我们很难界定一种和平的战略文化，但无论是文化传统理念，还是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的和平性战略文化具

① 这些案例包括台海问题和利比亚撤侨等。台湾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民族国家的建设问题，即领土和情感上的统一，而利比亚撤侨体现了国家对外事务中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民的责任。

② 这些案例包括中国对外关系开展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公关等问题，如战略对话、帮助苏丹以及傅莹方式等。

③ 全球治理、世界大趋势、国际公关和复杂性等论说，是中国创造性介入的国际压力。这些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或潮流趋势，客观上要求中国不能将自己与全球事务隔离开来，需要更多地介入，承担责任，同时也有利于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范和话语等。

④ 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包括新主权说、战略周边的潮流等，这表明，中国的创造性介入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以及先例可循，因此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

有相当多的证据支持。比如慎用武力说成为中国外交风格柔软低调细腻、很少勾连贯通武力的文化基础，因为中国文化注重以理服人、道义至上。《孙子兵法》说：“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又如，王道说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霸道文化的一种领导道义文化，包括“内圣而外王”、将重道义、名分、礼仪与重手法、策略、才智结合，主张“师出有名”、“尊天道”等。近代中国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都有大量尊王道而反霸道的国际理念论述。^①二则，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增强以及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国内政治开始影响对外关系，而且国内政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中国外交的国内利益分层现象日益明显，同时社会民意也对外交决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②这些利益影响的凸显，客观上要求中国外交不仅仅基于国家层面维护利益，而更多基于国内社会和政治层面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

二、朝向一种创造性介入的研究议程

尽管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对中国外交转型的背景、创造性介入的经验表现和理论支持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但是，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化创造性介入理念的研究。

第一，深化“介入”的类型学分析。由于创造性介入更多是一种积极的、成功的介入，但这只是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当中的一种类型，那么，接下来可以继续讨论的是，如果从外交理念或行为的类型学角度来分析，如何设计一个外交介入的类型学呢？因为，在一种完整的类型学基础上，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将相关国家包括中国的对外实践进行一种归类比较，同时也能更好地整理中国对外介入的各个维度，而不仅仅是创造性维度。

第二，创造性介入是一种全盘性介入，抑或是有选择性的介入。由于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我们难以具体了解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标准是什么。基于中国当前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总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完全改变，那么，可以得知，创造性介入肯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介入。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会选择创造性地介入，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会选择不介入。或者，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会选择“非创造性”的介入？

第三，如何评估^{[8]P.145-146}创造性介入的效果？在众多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讨论中，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是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纲领性的著作，因为它脱离了“口号式”的研究，而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介入》基于中国外交成功的案例，归纳了中国外交转型的理念和特征。但是，是否创造性介入所取得的政策效果都是成功的，如何区分出中国介入的积极和消极的效果？或者是，中国介入效果的消极或积极性，到底跟什么因素是相关的？其原因有哪些？是中国自身手段或策略的问题，还是受制于国际大环境？抑或是介入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外来干涉的力量等因素？因此，对于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效果，还可以进行更多细致的分析。而对于中国为何要实施创造性介入，仅仅从利益的角度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利益既可以解释介入的决策，也可以解释不介入的决策，从最根本上说，中国的外在行为某种程度上都是利益驱动的。

第四，在创造性介入的具体案例分析中，或许需要进一步探讨以下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凸显及其权衡，是中国实施创造性介入并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所必需的。

(1) 如何处理中国的创造性介入态度与西方

^①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对外的创造性介入提供较好的文化和社会支持。这些文化传统也是体现中国介入特色和特性的基础。

^② 中国国内利益的分层化和多元化以及海外利益的扩展，加之社会民意的舆论压力，要求中国外交必须克服一些惯常的思维惰性。这些国内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中国创造性介入动力机制中的核心来源之一。

大国的态度之间的平衡。众所周知，西方大国一向基于战略利益以及一些抽象原则，从而对相关热点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干预。这些原则包括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等论断，而中国传统上一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等、作为反对西方大国干预的策略。中国的创造性介入理念，是对于传统不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立场的超越，但如何保持中国创造性介入政策与西方霸权主义强行干涉别国内政政策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谨慎对待的问题。

(2) 利益和正义的平衡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个很好的国际交往传统是，中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坚持国际正义的立场赢得了很多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外交理念中道德和正义的驱动力并没有减退，但是随着中国自身利益的全球化以及外交的现代化，利益驱动在中国外交中的影响日益增大。^{[8][9](P.3-20)}在此背景下，中国创造性介入总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但是在具体操作和实践过程中，可能或必然会面临着利益与正义的内在张力。如何处理这对张力，直接关涉到中国创造性介入理念的国际效果以及附带效应，比如国际形象等。

(3) 介入与“反介入”的问题。中国的创造性介入，无疑为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特别是一些周边战略重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自身的地区责任和国家责任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但是，创造性介入尽管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不矛盾，但在具体操作以及理念上，必然会超越先前的一些中国外交原则，比如人权与主权的的关系问题等。^{[11](P.12-13)[12](28-30)}^①如果中国的创造性介入成为一种行为规律，或者说经常性的政策理念，那么由此带来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往常以主权高于人权等原则作为反对美国等霸主干涉发展中国家事务的准则，肯定会

受到很大的冲击。如何面对这种潜在的介入与“反介入”问题，是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以及创造性介入理念研究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4) 介入与“脱身”的问题。尽管创造性介入具有理论上的依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大量的中国外交成功案例的支持，但是，这种规范上的合法性以及外交实践上的可行性，依然难以保证未来创造性介入能够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效果。换言之，对于创造性介入的具体操作问题，未来可能存在诸多的突发变量，或者是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创造性介入的深入在效果不彰或遇到困难时，如何脱身？要不要脱身？或者是，虽然中国发挥创造性介入的作用，但也可能最终维护不了中国国家利益，甚或是相关各方都得利而中国却难以获得全面的利益，在此情境下，中国的介入应做如何调整？应对创造性介入做何种反思呢？比如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都存在诸多的潜在未知因素。

三、结语

在诸多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规范研究中，创造性介入理念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从学理层面来说，它将我们的讨论重点从规范意义上的“主义”之争推进到了具体的问题研究。中国外交转型或许已是一种事实，所以，关于要不要转型的争辩其实已是一个不需论证的问题（前提是中国外交已发生转型），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转型的条件和内容是什么？转型的方向和效果如何？等等。^{[13](P.22-35)[14][15]}^②创造性介入理念的提出，无疑成为这种分析路径中较为优秀的一种，尽管它只是提供了一种路径的概括和说明，同时也仅限于成功案例的分析，但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议程，它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研究议题和启发。

^① 从政策宣示层面来说，中国一直警惕西方国家假借“人道主义干预”为名，干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内政以及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等。

^② 西方学者较早就对中国外交的变化与转型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比如，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的周边地区合作、伙伴关系外交的进展，美国学者为此提炼了中国的“新外交”概念。

理论和实践是紧密互动的。在中国外交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必须依据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比如国际定位、国家力量(包括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环境,开展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同时,客观和及时地总结中国外交转型的经验、规律和模式,也会为中国外交的深入和开拓大好局面提供知识上的启示。笔者认为,

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归纳是必需的,但是,及时发现问题并尝试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有益的。总之,我们身处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过程之中,如何从一个研究者的立场总结中国外交转型的成功经验,同时发现其问题和不足之处,这是中国外交转型研究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 [1] 王辑思. 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思想[J]. 国际问题研究, 2011(2).
- [2] 叶自成. 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再谈中国的大国外交心态[J]. 太平洋学报, 2002(1).
- [3] 赵晓春. 浅析有关“韬光养晦”战略的争论[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5).
- [4] 王猛. 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6).
- [5] 邢悦, 张冀兵. “韬光养晦”战略再思考——兼论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J]. 国际观察, 2006(6).
- [6] 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7]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D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594169.html>.
- [8] 阎学通, 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9] Chih-yu Shih.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M].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 [10] 张清敏, 李啟窺. 中国对外行为的根源辨析[J]. 外交评论, 2011(4).
- [11] 张睿壮. 警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颠覆现行国际秩序[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9).
- [12] 赵晨. “干涉的义务”与利比亚危机[J]. 欧洲研究, 2011(3).
- [13] 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J]. Foreign Affairs, 82(6), 2003.
- [14] Pauline Kerr, 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 China's "New" Diplomacy: 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8.
- [15] Zhiquan Zhu. China's New Diplomacy: Rationale, Strategies and Significance[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2010.

(责任编辑 齐琳)